

丁福保《东文典问答》与清末日语教科书的发展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孙莹莹

[摘要] 丁福保是中国的近代学者、医学家和出版家。他于1901年进入南洋公学附属东文学堂,跟随日本教习藤田丰八学习日文,并以其师日语语法讲义为基础,同时参考多种日语语法书编成《东文典问答》。该书系丁福保以“畴隐庐”名义初版,由会文堂书庄代售,后经上海文明书局增补后多次再版发行。《东文典问答》在我国日语教科书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继承并发展了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对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清末中国人学习日语时不可或缺的日语教科书。

[关键词] 丁福保 藤田丰八 东文典问答 日语教科书

在近代中国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中介作用。而欲通过日本导入近代西学,日语教科书作为接触日本的一个工具,自然不可缺少。在清末的日语教科书中,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曾畅销一时,且为后人所称道;而丁福保的《东文典问答》出现在清末中国人学习日语的热潮中曾风行一时,虽具有与《和文汉读法》同样巨大的影响力,却逐渐被人们忘记。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全面梳理《东文典问答》的编撰与出版发行,并比较其与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关系,考察《东文典问答》对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的影响。

1 丁福保的日语学习与日本教习藤田丰八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号梅轩,别号畴隐居士,无锡人,近代学者、医学家和出版家,亦是文明书局创始人之一丁宝书的胞弟。光绪二十一年(1895),丁福保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伴随着清末的师日浪潮,科举日衰,新学渐兴,丁福保也在吴稚晖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走上求新学的道路。1901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学习英文,半年之后,自知

不能有成,遂转学至盛宣怀所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学习日文,后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担任教习。1909年,受盛宣怀和两江总督端方派遣,他赴日考察孤儿养育院和日本医学。回国后,丁福保开始向国内介绍日本医学,翻译日文医书,并编撰了举世瞩目的“丁氏医学丛书”,在中国引进日本医书及医学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丁福保在医书译介方面的卓越成就,与其早年所接受的日文训练有着非常大的关系。^[1]丁福保本人也曾说过(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体,下同):

余于医学稍得一二新智识,皆从日文中来。
余之日文,皆得力于官保设立之东文学堂。^[2]

东文学堂便是南洋公学下设的专学日文日语的东文科,相当于专科,已初步具备了高等学校的性质。^[3]1900年秋,南洋公学译书院曾招收学生120名,附属该院肄业日文。^[4]但盛宣怀认为“译书宜兼通中外之学,而尤以专门为贵”^[5],故而专设东文学堂以培养翻译人才,并邀请曾创办过上海东文学社的罗振玉为监督、日本人藤田丰八为日语教习。藤田丰八(1869-1929),号剑峰,1869年出

生于日本德岛县,1892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学科。1897年夏到上海,受聘于罗振玉主持的上海农学会并担任日文翻译,曾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任职,教过樊炳清、王国维等人日语。1901年,他再次受罗振玉聘请,出任南洋公学附属东文学堂教习,主要教授日语语法。曾任《教育世界》编辑、顾问,还曾随罗振玉任江苏师范学堂教习、两粤高等教育顾问、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总教习等。1911年回国,历任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教授,为日本近代重要的汉学家之一。

藤田丰八是丁福保的日语启蒙教师,对丁福保的日语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东文学堂后,丁福保从最基本的日语假名学起,并在藤田丰八的指导下开始阅读日本人落合直文的《中等文典》《广文典》《大文典》以及三土忠造的《中等国文典》等关于日语语法知识的书籍。

在东文学堂学习期间,丁福保对日语语法的学习颇为上心,经常“抄《文法问答》”,“看纯甫所译《文典》”。^[6]在购买完《日本小文典》的当天,便迫不及待地嘱咐同学章鹿萍帮其翻译《文典》以便随时阅读。为进一步学好日语语法,丁福保还曾经访问过廖少游(即廖宇春,曾编《东文新法会通》,上海东亚善邻学馆1902年版),专门请教日语语法知识。除此之外,丁福保还购买了《言海》《日本大文典》《寄学速成法》等日语书,并“借得《中学日本文典译本》,抄其最要者”(上海市档案馆编、袁家刚整理,2013:290)。

清末很多日语学习者以“读东书”为目的,因此仅凭借《和文汉读法》即开始阅读读本,进而读其他日语书籍。而丁福保通过在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系统学习,逐渐意识到日语文法学习的重要性,并深刻体会到欲“读东书”,必先习文法,而“呆读读本,不能阅书也”^[7]。待掌握日语语法中的关键词、助动词及助词等各种用法后,再阅读日文书籍。在东文学堂,丁福保的日语学习受藤田丰八影响极大,并以其师日语语法讲义为基础,同时参考多种日语语法书编成《东文典问答》一书,对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与日语教科书的编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东文典问答》的刊行与版本

《东文典问答》的成功编撰与近代文人吴稚晖有直接关系。1901年冬,吴稚晖自日本赴广东途经上海,对丁福保说(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体,下同):“东文文法,其紧要之处全在动词、助动词及助词等。如尽力教人,六七日间,无不通晓者。嗣后即可将普通东文书随阅随查。一月小成,三月业大就。子盍将文法编成浅说,以饷吾党之好学者。”(丁福保,1902-1:1)

不仅如此,吴稚晖还就编撰体例提出建议:“既成一书,将示不知谁何之人,终不能不立体例,多考证,以信吾说。又其说或琐细而实有宏益者,复将防不相识者之讪笑。因此而删去,既不称吾意,又不足解同人之惑。故不若随意问答之书,可以烦细委曲,不缚于体例,不累于文词,令吾说必罄之为愈也。”(丁福保,1902-1:1)

丁福保在听取了吴稚晖的建议之后于旧历辛丑年11月5日开始编《东文典问答》,“天甫明即起,每至夜深不睡,编辑至勤苦”^[8],“于功课之暇,从日本文学士监井正男、三土忠造等所著之文典及平日得于师友者,辑成问答十二章”。(丁福保,1902-1:1)

丁福保最初所编《东文典问答》为十二章,是一本以“问答”形式编撰的日语语法类教科书。所谓“问答”体,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来呈现,清晰明白,便于普及。如第十章“助词”：“问：何谓助词？答：助词者，助于语言文章之间，以表示上下句语种种相关之意也。其总名为テニヲハ，即天尔远波也。”(丁福保,1902-1:105)

关于本书的初版时间及发行机构,学界尚有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邹振环和薛冰的研究。

邹振环认为《东文典问答》初版于1902年初春(邹振环,2013:287),薛冰则认为初版不会早于1903年春^[9],且二人均认为《东文典问答》的初版发行机构为文明书局。

据丁福保《辛丑日记》可知,《东文典问答》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七日完成编撰,并于

当月送至天章印书局,印《东文典问答》一千五百部。(上海市档案馆编、袁家刚整理,2013:292)该书初版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封面标有“光绪辛丑”,即光绪二十七年,此时丁福保正在东文学堂学习。综合丁福保日记和该书封面信息,可以断定此书发行于1901年12月,换算成西历纪年,即是1902年1月,属于初春。从时间上看,邹振环所言属实,薛言有误。

关于发行机构,1902年初春,文明书局尚未成立,因此,发行所不可能是文明书局。丁福保自称“畴隐庐主人”,并以此名刊行了一套“畴隐庐丛书”,如《东文典问答》扉页内部记载为“畴隐庐丛书之八”,《增订第四版卫生学问答》为“畴隐庐丛书之四”。又《东文典问答》书后所附“新书广告”标明寄售所、批发所在上海棋盘街会文堂(丁福保,1902-1:“新书广告”);《增订第四版卫生学问答》标明“总寄售处在上海棋盘街广学会及棋盘街南首会文堂书庄”^[10]。结合上引丁福保日记等相关记载,可推测初版《东文典问答》系丁福保以“畴隐庐”的名义出版,并交由会文堂书庄代售。

邹、薛二人之所以会误认为发行机构是文明书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看到的是文明书局所发行的版本。该版版权页上标明出版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冬月二十日”,即西历1902年12月19日。扉页有红色字体的小序:“是书成于辛丑冬初用写真石版印刷五千部至秋间销售已罄。购索者日有数十至。兹重为修正改良,徇文明书局之请,编入普通教科问答全书,用活字排印,以归一律。”^[11]据上可知:其一,再次证实初版发行于旧历1901年12月;其二,1902年12月文明书局发行的《东文典问答》为此书修正版。

文明书局由无锡人士俞复、廉泉、丁宝书等人于1902年夏在上海创办。可能由于丁宝书的引荐,文明书局成立后,丁福保即开始参与文明书局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这为《东文典问答》再版提供了必要条件。1902年冬,“徇文明书局之请”,将《东文典问答》编入“普通教科问答全书”,对其修正并铅印重版。

初版《东文典问答》,全书共分十二章,依次为

总论、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助动词、副词、接续词、感动词、助词、接词、文句之剖解。后附《东文杂记》,除论述日文教学中的读本和文法之间的关系外,还介绍了日本文学史、学东文的门径及应购买之书籍。

与初版《东文典问答》相比,文明书局版增加“音韵”一章,附录部分增加了《东文提要》一篇。再版之际,该书不仅由文明书局发行,亦由开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时发行。

1903年,文明书局又邀请上海育材书塾日本教习茂原周辅为该书作序并再版发行。1905年,《东文典问答》又被上海科学书局编入“普通教科问答丛书”。该书在当时极受欢迎,据“上海科学书局书目录”,1905年版的《东文典问答》已是“增订第八版”,内容则“比初刻已增十分之四”,形式也改为洋装。由此可知此书后交科学书局印行。^[12]至1906年已出到订正第十版。^[13]

3 《东文典问答》与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

3.1 《东文典问答》受《和文汉读法》之影响

在编撰《东文典问答》之前,丁福保曾刊行过《增订第三版和文汉读法》,并在初版的《东文典问答》中提及该书:“日本留学生沈翔云原序云《和文汉读法》一册,字不过三千言,而指示读和文之法,简要明晰。苟通东文字母者,一读是册,未有不能读东籍者。第辗转传抄,不著作者姓氏,书中有引粤语者,意其粤人欤?至于粤人为谁,读者可以意会而得之。”(丁福保,1902-1:166-167)

1902年12月,文明书局再版《东文典问答》时,丁氏又在《东文杂记》中把上述《和文汉读法》的评价改成了《论学日本文之益》的内容以倡导“支那之士”“当以学和文和语为第一义”,进而说明日语学习的目的(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体,下同):

饮冰室主人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

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

(丁福保,1902-12:74)

从这个角度看，丁福保是在《和文汉读法》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日语的，且与梁启超一样，皆希望清末文人通过学习日语，进而学习新学。

《东文典问答》除正文十三章外，还附录《东文提要》《东文杂记》。正文十三章“论动词、助动词、助词等各种变化及用法”，与《和文汉读法》内容不同。为迎合清末中国人的速成心理鼓励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语，1902年12月，丁福保在文明书局版《东文典问答》的修正之际，增加了附录《东文提要》，将日文中的紧要字句，录成四十一款，论述学东文速成之法，与《和文汉读法》的编撰方法及其所强调的学日文的理念基本相同。这四十一款，类似于《和文汉读法》的四十二节，分项论述阅读日语句子时的规则。四十一款之后复增加“七款”对常见东语作了解释说明，并认为：“或谓学日本文，数日可小成，此言诚非诬也，兹将东文中紧要字句，录成四十一款，倘能依次熟记，即可当数日之小成矣”。(丁福保,1902-12:66)

丁福保认为学日语“数日可小成”，并强调习普通文“愚者三月成”(丁福保,1902-1:159)。这些观点，还是受到了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影响，这也是丁福保开始从事日语学习的主要动机。清末日语“速成”之风盛行，丁福保欲宣传《东文典问答》之语法的重要性，不得不模仿《和文汉读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东文典问答》也是从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接续过来的，它收录的《东文杂记》也类似于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也有去日本旅游的‘饮冰室主人’的影子出现。”^[14]

但丁福保并未完全模仿《和文汉读法》。梁启超重点强调日语中的“天尔远波”等助词，并认为只需掌握“てにをは”等助词即可，至于动词、形容词的语尾变化则“毫无用处，置之不理可也”^[15]。而丁氏在《东文典问答》中却强调“此书之最紧要者，共有三章，动词、助动词、助词也。”(丁福保,1902-1:1)并在同年出版的《广和文汉读法》中加

深了这种理解：“和文恶可汉读哉？所谓汉读者，人云亦云耳。凡动词、形容词等，虽写汉字，其语尾皆有变化，语根宜读和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丁福保,1902:1)，“东文之法已略备于以前诸节，阅者如悉心考之，可以得其门矣。惟所难知者，动词形容词之变化耳。”^[16]梁启超自己也承认，编撰《和文汉读法》“其时不解日本文法”^[17]，“苟依此法，不求能文而求能读”。(梁启超,1902[15]:95)而丁福保的《东文典问答》却以“东文典”冠名，专门讲解日语语法。

可以说，丁福保的日语学习受启于《和文汉读法》，并在此书的引导下开始编译医学方面的书籍，但丁福保并未完全局限于《和文汉读法》。他师承日本教习藤田丰八，是南洋公学东文学堂培养出来的日语人才，受过系统的日文训练，其学习经历和梁启超不同，因此对日语的认识程度也不同。正是因为丁福保阅读了当时日本人编撰的《中等文典》《大文典》《言海》等书，使其对日语的认识一步步加深，其眼界、其视野已远远超出了《和文汉读法》。

3.2 《东文典问答》对清末日语教科书编撰的影响

1903年，茂原周辅曾在文明书局再版序言中，用比喻的手法赞誉此书：“其书中所说，简而得要。凡欲学日文者，先因此书悟其布阵配置，后驱马而望日文战场，则可得十垒中之七八，其他二、三垒则待语典之援军。夫文法者，先有文而后出文法。文之妙者未必局限于文法圈内，犹如善战者未必置重于兵法。要之，运用之妙存于一心。此书读者，若由此书之十三则而知日文大法，恰如善战者于孙子十三章，终身用之，亦无用尽之时，岂不甚妙哉。”^[18]茂原周辅把《东文典问答》之十三章比作“孙子兵法十三章”，认为通过《东文典问答》的十三章可以了解日本文法，“终身用之，而无用尽之时”，可见其对该书评价之高。

《和文汉译读本》一书的译者，亦大力推荐该书，认为该书“所论各种文法皆明白晓畅”“皆独修之善本”，且强调“但读读本终鲜有济，宜与文法并习”，指明读者看《东文典问答》，以补读本的不

足,达到“互相参看,必能字字透澈,有左右逢源之乐”。^[19]

据笔者所知,《东文典问答》是清末国人自编的最早以“东文典”来命名的日语教科书,它的编撰为当时及日后日语教科书的编撰提供了范例。

首先,在编撰方法上《东文典问答》为其后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19世纪末,日本模仿英国的“英语文典”等西方“品词”语法理论体系创造了日语“文典”式“品词”著作理论体系。文典式语法著作贯穿着一个基本语法理论内核,即“品词”。英语出身的丁福保在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后发现了这个特点,于是在编写《东文典问答》时,基本上采用日本人编撰“文典”的方式,将日语的品词分为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助动词、副词、接续词、感动词、助词、接词等十种。

继《东文典问答》之后,《日本语言文字指南》(1902)《中日文通》(1905)《日本俗语文典》(1905)《东文法程》(1905)《日语教程》(1906)等日语教科书大多把日语进行八品词、九品词或十品词分类,以此种形式对日语语法进行解释说明。例如190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文法程》分为总论、字母、音韵、名词、代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接续词、助动词、感动词、助词等章节,显然其编撰体例模仿了《东文典问答》;再如1912年出版的《言文一致中国语文典》虽然是一本中文语法书,在章节划分上也和《东文典问答》大致相同。清末国人自编的教科书中,不仅日语语法类教科书,而且综合类教科书在讲解日语语法时,亦首先注重日语品词的划分。

其次,强调语法在日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丁福保在《东文典问答》中以“问答体”的方式强调了语法在日语学习中的重要性。综观清末的日语教科书,语法教科书的数量远远高于会话类、读本类日语教科书。从丁福保开始,日语语法书籍的编撰成了热门,这亦是受丁福保在《东文典问答》中所强调语法的重要性之影响。此外,即使会话类日语教科书也在书中首先讲解语法问题,如《东语完璧》(1903)。关于日语语法,宏文学院的

教授松本龟次郎曾说过:“教授者与被教授者双方,不通彼此会话,教文法,实属困难。但欲在短时间内达到日本语文教学的最佳效果,就必须讲解文法。”^[20]松本龟次郎基于自己在宏文学院的教学经验,强调了日语语法在中国人的日语学习中的重要性,而国内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学生丁福保却比松本更早地提出了这一想法。除此之外,丁福保还在书中首次介绍了日语查字典的方法,但实际上他仍然是在强调语法中掌握日语动词变化的重要性。

第三,强调口语的重要性。

丁福保把“东文书”分为中古文、俗文、普通文三种,认为其难易有别。丁福保认为中古文和俗文(即口语)皆难读,然“幸而讲学问之书,十八九用”普通文,故“通普通文亦可矣”。“苟通普通文,因而以普通文,进读中世文及俗文,亦如舟之有辑”。丁福保在强调普通文重要性及易学性的基础上编撰了《东文典问答》,同时指出该书所答问者为普通文,并希望:“今之读东文者,得其紧要关键,演成浅说,使壮年失学之人,尽解普通东文。”(丁福保,1902-1:167-168)尽管如此,丁福保并未否定俗文,他认为“和文之根底在为一俗文”,“如不通此,则通俗应酬文无以读也”。(丁福保,1902-1:157)松本龟次郎在回忆宏文学院的授课情形时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追求速成,要求日本教习只教授日语当用汉字中间夹杂的假名即可。(二見剛史,2016:317)在明治时期日本的言文统一尚未确立、清末中国人希望日语速成的背景下,在国内东文学堂学习的丁福保能意识到日语口语的重要性,实为难能可贵。

《东文典问答》在日语教科书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编撰方法上,都为后来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开创了良好的先例,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是日语语法类教科书的嚆矢。

4 结 语

《东文典问答》不仅是丁福保在南洋公学东文学堂学习成果的总结,亦是对藤田丰八日语教学

方法的发扬与推广。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为导入日本近代新式教育,大批留学生赴日留学,同时亦有大批日本教习来华讲学。从藤田丰八的教学成果也可以说明,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日语教学水平并不低于同时期日本的留日学校。另一方面,丁福保凭借在东文学堂的日文训练,开始从事翻译出版活动,译介了大量日本医学著作,在中国引进日本医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文典问答》在清末屡次再版,极为畅销,是清末非常受欢迎的日语教科书,对清末的日语学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至1903年,因该书销路大好,不仅上海地区的日语学习者,甚至京师大学堂“诸生向文明书局购求《东文典问答》者,每日不下数十起”^[1],竟至文明书局“应接不暇”,并使其积银三百元。(丁福保,1948:1)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售书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书商趁机盗版发行,丁福保不得已,送呈学务大臣,存案严禁翻印。(《大公报》,1903-9-23)至丁福保受聘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担任算学和生理学教习之际,《东文典问答》早已“风行海内”(《大公报》,1903-8-17)。1903年2月,正值文明书局版《东文典问答》刚刚发行两个月,《新民丛报》甚至将此书与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相提并论。^[22]说明当时丁福保的《东文典问答》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并不亚于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

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和文汉读法》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而关于《东文典问答》却寥寥无几。且前人关于该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和版本方面。如邹振环在述及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办学成效及教科书的编撰方面,重点介绍了《东文典问答》的内容;薛冰则对《东文典问答》的内容、版本展开了研究,同时指出该书在清末流传很广,影响极大。但既往研究对《东文典问答》所进行的考察还不够充分。为此,本文重点考察了《东文典问答》的编撰和刊行过程,揭示了该书在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和文汉读法》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而关于《东文典问答》却寥寥无几。且前人关于该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和版本方面。如邹振环在述及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办学成效及教科书的编撰方面,重点介绍了《东文典问答》的内容;薛冰则对《东文典问答》的内容、版本展开了研究,同时指出该书在清末流传很广,影响极大。但既往研究对《东文典问答》所进行的考察还不够充分。为此,本文重点考察了《东文典问答》的编撰和刊行过程,揭示了该书在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注

- [1] 邹振环.丁福保与“丁氏医学丛书”[A].邹振环.疏通知译史:中国近代的翻译出版[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87.
- [2] 丁福保.畴隐居士学术史[M].上海:诂林精舍出版社,1949:157.
- [3] 邹振环.译林旧踪[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87.
- [4]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5.
- [5] 夏东元编.盛宣怀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711.
- [6] 袁家刚整理.丁福保《辛丑日记》释注下[A].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4辑[C].上海:三联书店,2013:288.
- [7] 丁福保.东文典问答[M].畴隐庐丛书第八石印本,1902-1(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67-168.
- [8]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M].上海:诂林精舍发行,1948:15.
- [9] 薛冰.槛外读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154.
- [10] 丁福保.卫生学问答[M].辛丑九月无锡畴隐庐重印本,1901(光绪二十七年)“新书出版广告”.
- [11] 丁福保.东文典问答[M].上海:文明书局,1902-12(光绪二十八年).
- [12] 薛冰.六朝松随笔文库金陵书话[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268.
- [13] 邹振环.上海东文学社与南洋公学的东文学堂[J].或问,2005(9):43-56.
- [14] 吉田薰.梁启超与中国留日学生[A].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238-239.
- [15] 沈翔云编.和文汉读法[M].东京:励志会译书处,1900(明治三十三年):5.
- [16] 丁福保.广和文汉读法[M].出版社不详,1902(光绪二十八年):65.
- [17]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问答[J].新民丛报,1902(15):94.
- [18] 丁福保.东文典问答·序[M].上海:文明书局,1903:1.
- [19] [日]坪内雄藏著,沙颂虞、张肇熊译.和文汉译读本·例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1(光绪二十七年):3.
- [20] 松本龟次郎.隣邦留学生教育の回顧と将来[J].教育,4月号,岩波書店,1939:540.
- [21] 时事要闻[N].大公报,1903-2-28.
- [22] 翻译与道德心之关系[J].新民丛报,1903-2.

参考文献

- 森田峻太郎著、丁福保译.传种改良问答[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1(清光绪二十七年).
- 王鸿年.日本语言文字指南[M].东京:王惕斋发行,1902(清光绪二十八年).
- 新智社编辑局编.东语完璧[M].上海:新智社,1903(清光绪二十九年).
- 三土忠造著、丁福同译.中等日本文典译释[M].上海:文明书局,1903(清光绪二十九年).
- 张鸿藻.中日文通[M].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
- 吴初、孟先.日本俗语文典[M].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
-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东文法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
- 湘渔.日语教程[M].著者刊,1906(清光绪三十二年).
- 牛亚华、冯立升.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学交流[J].中国科技史料,2004(4).
- 肖朗、孙莹莹.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 宮錦舒.言文一致中国語文典[M].東京:文求堂,1912.
- 劉建雲.中国人の日本語学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M].東京:学術出版会,2005.
- 二見剛史.日中の道 天命なり—松本龜次郎[M].東京:学文社,2016.

作者简介:孙莹莹(1982—) 女 汉族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研究
联系方式:E-mail:xiaoyingzi6663@126.com

Ding Fubao's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Ding Fubao was a scholar, medical scientist and publisher in modern China. In 1901, he entered the Japanese School at Nanyang College in Shanghai, and approached a Japanese teacher named Toyohachi Fujita to learn Japanese. Based on the Japanese grammar handouts of his teacher, he compiled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referring to a variety of Japanese grammar books. The book was published by Ding Fubao in the name of "Chou Yinlu" and sold by Hui Wentang Bookstore at first. It was supplemented by Shanghai Civilization Bookstore and then reissued several times.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textbooks in China. It inherited from and further developed Liang Qichao's *Learning Japanese through Chinese* and guided the self-compilation of Japanese textbooks by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re it represented an indispensable Japanese textbook.

Keywords: Ding Fubao; Toyohachi Fujita;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Japanese textbooks

Author's Information:

Sun Yingyi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2
Doctoral Student at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xiaoyingzi6663@126.com